

梁东明 在地名中永生

●刘科



人们不论是出差还是外出旅行,往往都选择安全舒适的火车出行,当一列列火车在京通铁路上呼啸前进时,运行在通辽和奈曼之间时会经过一个叫“东明村”的火车站,东明村火车站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5月1日伴随京通铁路交付临时运营,1981年6月1日正式投入运营,车站中心里程位于京通铁路709公里555米处,车站站名来源于车站驻地东明村镇东明村地名,而东明村地名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梁东明而由刘家茶馆改名而来。东明村地名的由来刻着一个革命者的英雄故事和传奇往事,他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刘家茶馆的中共奈曼旗委宣传部长梁东明烈士。

自古英雄出少年

梁东明原籍广东省广州市,1919年9月25日出生于广州市的一个教师家庭。梁东明6岁进入小学读书,13岁考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18岁考入广州知用中学读高中。学生时期的梁东明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进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正在读高中的梁东明怀着满腔的热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主张。他经常与一些进步同学聚会,学习革命理论,梁东明和许多进步青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路线,于是这群充满青春朝气的青年向往到延安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们经常讨论怎样到陕北投身革命斗争。

1938年6月,日本统帅部决定继续侵占武汉、广州,进一步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中国以沉重打击,控制国民党政权的海外通道,扼其经济生路,迫其立即投降。日军对广州展开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日本机群的轰鸣声响彻广州上空。1938年7月,广州陷落前夕,梁家欲举家迁往香港避难,梁东明父母逼他和全家一起去香港,梁东明坚决不肯前往香港避难。于是他偷偷离开家,瞒着父母毅然北上,从广州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7月23日进入我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陕北公学榆县分校(榆县今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到校不久,梁东明给家里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这封信是他离开广州后给家里写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字里行间透露了梁东明对家人的依依亲情和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信中这样写

道:“你们太爱惜我了,舍不得让我离开家,舍不得让我去干今日每个青年应该做的事,应尽的责任。你们逼我到香港,这使我不得不这样,不通知你们就走了。我以做儿子应有的态度接受、感谢你们给我的爱,可是我不能依你们说的去做,因为我更应该接受祖国的爱,听祖国的呼唤啊!”

陕北公学育才才

在陕北公学学习3个月后,梁东明顺利毕业,被党组织分配到活动于陕北关中一带的八路军某部特务连工作,后来被提升为特务连二排排长。1940年梁东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中央党校深造。1942年他和一起工作共同战斗的女干部刘玉春结为革命伴侣。第二年,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梁小红出生。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党派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地区开展工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梁东明夫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二人带着儿子星夜赶赴东北,经过艰苦跋涉,于1945年冬到达承德。到达承德后先在阜新地区工作,后由辽吉五地委委派任奈曼旗,任奈曼旗委宣传部部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

梁东明同志由阜新来到奈曼后,积极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广大的农牧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斗争。梁东明同志的爱人刘玉春和梁东明一起来到奈曼后,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积劳成疾,不幸于1946年病逝于大沁他拉。刘玉春病逝时,正是梁东明在八仙筒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关键时期,因工作太忙脱不开身,未能及时返回大沁他拉。得到爱人去世的消息,梁东明肝肠寸断,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但他深知革命工作的重要性,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强忍悲痛含泪掩埋了妻子,并将当时只有4岁的儿子梁小红托付给当地的农民抚养,义无反顾地返回到工作岗位上。

英雄鏖战八仙筒

随着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定,背信弃义地调重兵向我解放区进攻,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郑家屯、保康、茂林、彰武、法库、康平等城镇后,敌人立即派遣大批特务进入哲里木盟的库伦旗、科左后旗、奈曼旗等地拉拢勾结反动地主、王爷、伪军官、地痞流氓、土匪进行破坏骚扰活动。当时活动在奈曼旗境内和附近的反动武装有许多股,有名的土匪头子有梁洛布等、嘎斯拉、金宝仓、黄土忠、野狼等,匪众人数约有一千五六百人。这些反动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勾结在一起,大肆破坏我党的减租减息工作,杀害逮捕我地方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地处奈曼旗战略要地的八仙筒,是敌人围攻的重点目标。

1946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拂晓,一千五六百名土匪包围了奈曼旗北部重镇八仙筒,企图一举消灭我人民政府和人民武装。我军在奈曼旗大队副大队长罗云彪、奈曼旗委宣传部长梁东明的指挥下,立即予以坚决还击。罗云彪、梁东明、王克等领导同志身先士卒,亲自登上东南炮楼与战士并肩作战。战斗中参加过长征的奈曼旗大队副大队长罗云彪不幸中弹牺牲。罗云彪的牺牲,激起了战士们的复仇怒火,有的战士跳出工事向敌人射击,手榴弹像雨点一样向敌人头上砸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罗云彪牺牲后,由梁东明接任总指挥。9时许,敌人发起第二次攻击。在攻击之前,土匪点着了西城门,西城门紧靠大队部所在院落。敌人想借助烟雾攻击我军,有一股敌人借着烟雾的掩护冲进了南大门,战士们同敌人展开拉锯战。敌人经过多轮进攻始终未能攻进大院,于是便换了花招,他们把被俘的我军同志用铁丝绑上脚,用枪逼着来挖墙。被俘的同志到墙前一跃跳进了护墙沟,趴在里边大声地叫:“同志们放心,我们至死也不为敌人出力,你们狠狠打击敌人吧!”他们的英勇行为,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中午时分,敌人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这次敌人采取了地上、地下同时进攻的战术,地上就是敌人集中全力进攻我军火力支撑点东南角上的炮楼;地下就是挖地洞,企图从地下攻破我军防守。我军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立即把战士们分为多个战斗小组,实行分片包干,如果有敌人从地下冒出来,就地消灭。经过激烈战斗,我军打退了敌人第三次进攻。在打退敌人第三次进攻之后,梁东明立即主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会议决定:等待援兵到来,内外夹击消灭敌人;如果天黑之前援兵仍不到,就组织突围。随后,梁东明向全体指战员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对战士们进行必胜信心的教育,使战士们斗志昂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下午三点多,敌人发动了第四次进攻。正在双方交战之时,敌人突然乱了阵脚,有的回马向四处跑去,我军以为援军已到,立即向外冲。敌人看到我们向外冲,马上又折返冲击,双方继续交战,我军退回院内。此后,敌人再也没有向里猛攻,只是监视我军活动。事后得知,是匪头子梁洛布派人拉拢队的一个巡逻班出来巡逻时听见枪声赶来,牵制敌人一下,造成敌人“炸了窝子”,此后未敢再进行强攻。

夜幕渐渐低垂,但敌人仍然紧紧包围着我军,也没有援军到来的迹象。于是梁东明、王克等领导研究决定突围,突围点的选择经过周密考虑,一是选择敌人防备薄弱的北面,二是选择靠近高粱地的西面,并确定了突围后的集合点。在突围前,为了麻痹敌人,战士们用枪筒、木棍子顶着帽子,举过墙头,敌人向帽子猛烈射击,当敌人发现上当后停止射击。趁着敌人射击间隙的机会,战士们一跃跳出院墙。由于梁东明指挥若定,我军顺利突围,并很快到达集合地点。

英名永留天地间

1946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梁东明部长带领53名干部战士到刘家茶馆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并调集支前物资。当天夜里,大地主李福东偷偷给土匪报信,土匪头子梁洛布等纠集了一百多名土匪包围了刘家茶馆。当时的战斗相当激烈,梁洛布等的土匪武装不停向刘家茶馆开枪、投掷手榴弹。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东明部长当机立断,果断下令突围。战士们听令,上马冲出村外,梁东明亲自断后,阻击追敌,掩护突围。在突围战中,梁东明部长不幸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梁东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奈曼旗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英雄,1948年,人民政府把“刘家茶馆”改名为“东明村”。还谱写了歌曲《东明啊,我的家乡》歌颂这位为人民献身的烈士。1980年京通铁路开通后,这里的火车站也取名叫“东明村站”,让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都能想起梁东明烈士的故事,怀念这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人民英雄。

梁东明用年轻的生命保护了老百姓,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一切。他的名字刻在了地名里,更刻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永远记住人民英雄梁东明烈士,把他勇敢、爱国、无私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铁血铸就东来魂

●李洪彬

在那个炮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总有一些英雄的名字,如璀璨耀眼的明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而张东来烈士,便是其中的一颗。他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赞歌,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就是激励后人不断奋进的强大动力。

临危受命

张东来,1920年生于山东省平邑县张庄。1937年6月,17岁的张东来成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胆识过人,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随军在山东、河北、江苏等地转战。1946年1月,张东来随军进入哲里木盟地区,任174部队警卫连排长,在通辽余粮堡驻扎。

1946年5月下旬,组织派遣张东来和战士索兴周到东科中旗(旗政府所在地,今科左中旗巴彥塔拉镇)第八区(1948年划归开鲁县,今东来镇)开辟新区工作。张东来到八区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动群众。1946年6月初,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通过做思想工作,将伪满时期的区长李景尧、股长赵汉奇、吴铁虎等人争取过来,建立起八区区政府,组织任命张东来为副区长。由于对敌斗争需要,必须建立起人民的武装。张东来主动联系,得到了驻余粮堡部队第二十六团的帮助。6月中旬,将国民党地方维持会组织、由土匪游民组成的“四合福”“爱里民团”反动地主武装全部缴械。经过清洗,四十多人去留各半,又吸收了一部分基本群众,整编建成区中队。区中队刚建立时,枪支不足,仅有短枪三支、大枪十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三枚。张东来多方动员做工作,并组成中队班长李某到刘长明屯、兴安屯、庆合祥屯等处借取枪支,充实区中队。张东来又带领区中队,逐屯深入,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武装的枪支弹药,开展减租减息和对地主的清算斗争。各村屯很快都建起农会、妇救会、儿童团。为了稳定人心,维护社会治安,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张东来带领区中队在八区内,多次进行剿匪。

张东来在部队经过多次战斗的锻炼,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屡战屡胜,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加上他的枪法超群,对付土匪绰绰有余,数次剿匪都大获全胜。当年见过他或和他共事的老人回忆:张东来在访贫问苦工作中,一点当官的架子都没有。走到李二堡家,看到他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眼泪夺眶而出。把兜里仅有的几元津贴塞到了李二堡手里。他操着一口山东口音,身材魁梧、大高个、红脸膛,手使双枪,人们都称他是“神枪手”,深受劳苦大众的爱戴。而在八区流窜骚扰的土匪,受到几次打击之后,一听说张东来的名字,都不寒而栗,望风而逃。他对敌人疾恶如仇,对人民无比热爱。张东来为了震慑敌人,进一步鼓舞群众斗志,发动群众团结起来,为争取彻底翻身解放而奋斗,召开了公审王祥字的群众大会,宣布了其欺压百姓的罪行后,就地决处,为百姓除了一害。

风雨如磐

张东来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沉重打击了敌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区中队的各项工作正在铺开。在那个风雨如磐、刀光剑影的日子里,张东来和索兴周深入虎穴开辟新区,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面对的是四股反动势力。第一股反动势力是日伪政治残余。1946年6月初组建的区政府,是在争取过来的伪区政府基础上建立的。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张东来任八区副区长,正区长还是日伪时期的原区长李景尧。成员有赵汉奇、吴铁虎等都是旧班底。虽然日寇被赶走了,但他们受十几年殖民统治熏陶的反动思想并没有清除干净,在当时环境下,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第二股反动势力就是地主武装爱里民团的残余。爱里民团被我军缴械,而他们的队伍清除各半,留下的一半编入区中队里。队长还是爱里民团的队长肖廷福。索兴周是指导员。但区中队骨干还是原民团的成

员。第三股反动势力是土匪势力,张东来、索兴周带领区中队击毙了金宝昌匪络主要成员李起落、朴德龙,活捉并公审镇压了王祥字,但只消灭少量恶匪,并未给予毁灭性打击,其主力仍在周边地区活动。第四股反动势力就是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建立红色政权减租减息斗争地富。其实就是伤害了他们根本的剥削利益。

日伪残余,民团残余,土匪残余和剥削阶级在八路军所代表的强大的解放阵营前,表面上都是装模作样,而背地都是一个鼻子眼出气臭味相投。在新开辟的八区,本来这四股反动势力已足够可怕的,他们现在联手勾结在一起那就更可怕了。在敌我双方来回拉锯的阶段,他们便蠢蠢欲动,伺机东山再起。

7月末,原爱里民团的班长李某领着十多个人带上三把香,钻进了村西头的山神庙里,然后把香插入三个香烛碗里,点着了之后,冲着山神磕头拜把子搞封建的结拜,参加的人员有民团成员叶喜大巴、王信,还有原民团成员肖廷福、孔某和马某等人。其中也有被清洗出去的民团成员,他们盟誓“有官同做,有马同骑,有钱同花”。同时,区中队队长肖廷福,日伪股长赵汉奇也在区中队里拉帮结派。除了原来的民团成员,还有叶喜大巴、尼玛德外吉等人也发誓盟誓一家,团结一致,以后有变故绝无三心二意,谁泄密就枪决。在张东来和索兴周身边,除了四股反动势力外,还潜伏着一种危害:就是内奸和叛徒。张东来的通讯员叶喜大巴接受了敌人送一枪一马条件后叛变。还有已经暗中策反了的王木匠和宋玉山。

英勇斗争

1946年9月10日,八路军有一段战略转移时期,国民党卷土重来,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这四股反动势力开始偷偷地行动起来,以为到了翻天的时日,仅用七天时间,就策划了杀害张东来、索兴周的反革命事件。

1946年8月31日,金宝昌匪络的张福田(匪号六龙)从奈曼来到庆合祥屯,与牛万荣串通:“奈曼侯沁苏木政府被砸了,阜新的国民党来了,共产党长不了啦。”时隔一天,与牛万荣勾结后的肖廷福,在区政府与伪区长李景尧、伪股长赵汉奇等人密谋。他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我军暂时转移是失利败退,便决定召回流窜到奈曼的金宝昌匪络作为靠山。

9月6日,张东来、索兴周等人因等待生产大车,未能及时随大部转移。牛万荣、肖廷福等人趁机策划杀害张东来的阴谋。他们以金宝昌匪络为外援,带领60余名匪徒向八区政府所在地永发屯逼近,远远放枪,佯装进攻,实则虚张声势,制造紧张气氛。区政府内有肖廷福、赵汉奇做内应,听到枪声后,便怂恿张东来:“奈曼来了六十多名土匪,我们只有二十多人,抵挡不住,最好撤往庆合祥屯,那里围墙坚固,设有炮台,易守难攻。”庆合祥屯当时是方形村堡,只开一个南门,围墙高一丈二、底宽八尺,内有马道,在东北、西北、正南分设三座炮台,互为呼应。全屯六十多户人家,其中贫苦雇农、佃农五十多户,自耕农数户,地主富农三四户。张东来在八区工作时间短,人生地不熟,便带领区政府和区中队八十多人撤进庆合祥屯。

此时,毫不知情的只有张东来、索兴周、郝才三人。此前,李某曾按张东来指示,从庆合祥、兴安、刘长明三个屯子借来九支枪,补充区中队装备。这时,李某主动向牛万荣邀功:“向你借三条枪,今天要、明天也要,这回我把张东来给你领来了,枪你想怎么就要怎么要。”牛万荣立即与儿子牛成(红枪会队长)在屯内设下圈套,实施“调虎离山”之计。

他们周密安排:如何对付张东来、索兴周、郝才,谁守门、谁守窗,分工细致、滴水不漏。据知情人回忆,牛万荣与牛成等人在自家东屋召开密谋会,明确分工:曹殿清、韩玉文把前窗,单忠诚、沈凤山堵后窗。张东来进村后,召集区中队部署防卫,准备与土匪作战。这时,



贫苦农民王木匠假意邀请张东来到刘万春家喝水。牛万荣和弟弟高发随后跟进,牛万荣倒了一碗茶水递给张东来:“请区长喝水。”趁张东来接水之际,高发猛冲上去,双手抱住张东来双臂——因张东来善使双枪,腰间别着两支手枪,这是事先定好的计划。牛万荣趁机说:“张区长,把你的手枪借给我使两天。”说着就上前抢枪。张东来猛地抽出一只胳膊,拔出右手直指牛万荣脑门,牛万荣头皮被戳破,但枪未打响,因为子弹没有上膛。这时,两支大枪从后窗伸进,厉声喝止:“不准动,动就打死你!”嘶扯中,张东来将牛万荣按在身下。王木匠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冲进屋,众人一拥而上,将张东来捆绑起来。张东来的通讯员叶喜大巴早已叛变,此时已爬上房顶。另一名通讯员郝才,被两名红枪会成员用扎枪抵住胸口,被缴去长枪。进村后被安排到李某家的索兴周,也被人控制、缴械捆绑,叛徒宋玉山参与对索兴周、郝才的缴械,抢走日造三八大盖步枪一支。

牛万荣等人对张东来、索兴周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张东来被打得头部肿胀、双眼青紫、鲜血淋漓,敌人还残忍地扒去他的裤子。张东来宁死不屈,厉声说道:“我来东北,是为穷哥们翻身,我不怕死!”二人被折磨至昏迷后,匪徒将他们交给金宝昌匪络。匪首刘振生亲手开枪杀死了张东来,随后众匪徒乱枪射杀索兴周。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叛徒王木匠——他刚才还上蹿下跳、参与谋害,转眼牛万荣突然翻脸,下令将其捆绑,与张东来、索兴周一同押走。王木匠磕头求饶,见无效便吓得魂飞魄散,最终得到叛徒应有的下场。土匪枪杀烈士后,弃尸荒野而去。当地开明绅士秦树梅,曾在伪村公所做事,给地主古秀园管过事,他自掏腰包买了白茬棺材,装殓烈士遗体,堆起坟丘。秦树梅的义举,受到当地百姓和人民政府的赞扬。参与谋害张东来、索兴周的凶犯,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全部罪有应得、相继伏法。

人们为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将张东来牺牲地永发屯改为东来村。1956年,将解放战争时期张东来工作过的八区命名为东来乡;1958年成立红旗第八人民公社;1959年改称东来人民公社;1984年撤销公社,设立东来镇。1970年6月1日,张东来烈士纪念碑落成。碑正面镌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镌刻张东来烈士生平事迹。经过多次行政区划调整,2006年5月,开鲁县实施苏木乡镇机构改革,重新调整区划,调整后的东来镇由13个行政村组成。

感怀革命先烈,汲取革命传统“营养”,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我们要永远铭记先烈遗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英雄精神就是民族精神,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